

保定莲池书院学子近代从业述评

李占萍¹, 闫 银²

(1.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 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保定莲池书院学子时逢中国近代社会剧变时期, 参与了近代社会活动, 名噪文坛, 彪炳仕途, 振兴实业, 教书育人, 他们的近代从业历程可以为当今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莲池书院学子; 从业; 民族精神; 人格养成; 为学治事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5)02-0110-09

保定莲池书院是清朝设立的直隶省城书院,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古莲花池中。莲池书院继承古代书院优秀的文化传统, 名师讲学, “士多以英伟识时务著声, 后来兴事创业者, 咸出其门”^{[1]118}。本文将晚清莲池书院学子定义为: 凡是以莲池书院为核心的, 受到了莲池书院影响, 传播莲池精神的正式和非正式学生。本文主要以下列学子为例: 常增璋、籍忠寅、邓毓怡、韩德铭、梁建章、杜之堂、尚秉和、叶崇质、刘培极、徐德源、刘吟皋、王仪型、邢赞亭、吴闾生、贺涛、李景濂、李刚己、王树枏、刘春霖、刘春堂、贾恩绂、谷钟秀、傅增湘、刘若曾、胡景桂、齐福丕、高步瀛、刘登瀛、崔栋、阎凤阁、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廉泉、柯劭忞、刘彤儒, 将其近代从业放在同一历史坐标系内, 突出教育的后续评价功能, 为当今社会转型和大学人才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一、莲池书院学子在清末的从业概况

近代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传播者与创造者, 也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群体。由于莲池书院的“政治学科, 日召诸子。尤有进者, 天演哲理”^{[1]116}, 学子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词章学术基础上, 开始吸纳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文化。他们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个人抉择能力, 在国家政策和近代社会情势下, 主动参与到清末的社会活动中。

在政治思想领域, 莲池学子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民主化意识和能力, 通过多种途径来参政议政。

清末的忧时之士奔走国中, 呼号海外, 尤其是 1895 年的“公车上书”活动演绎了新式知识分子维新思想的内涵。贾恩绂成为签名者之一。有研究搜集了公车上书提名录, 在直隶省提名中, 赫然出现“贾恩绂 号佩卿 天津府盐山县人”^{[2]90}。蔡如梁聆听了康有为宣读的万言书, 毅然在万言书上签字。廉泉在公车上书中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 成为江苏省参与公车上书的签名者之一^{[2]92}。齐福丕参加了公车上书, 后来将维新思想带回了老家南宫。

学堂风潮是清末新式学堂的学生表达爱国救国思想和政治诉求的行动方式。1902 年, 京师大学堂

收稿日期: 2015-01-12

基金项目: 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一般项目“保定莲池书院学子近代从业研究”(HBWY2014-Y-C018)

作者简介: 李占萍(1970-), 女, 河北康保人, 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历史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职业教育史。

重新开办,谷钟秀考入师范馆。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学潮和留日学潮的震撼下,谷钟秀发起了以拒俄运动为核心的学堂风潮,并拟稿《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

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正式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刘若曾被调随五大臣赴泰西考察政治。后来,清政府设立宪政编查馆,刘若曾兼充提调。吴闿生也曾被绍英选作随从,虽然西行受阻,但在1908年,吴闿生时在直隶总督杨士骧幕中^{[3]323}。

从1906年至1910年,清政府从预备仿行宪政进入了实施阶段,但宪政改革也引起了时人的质疑。1910年,马其昶委以学部主事。“其昶睹当国之操切,哀民生之况瘁,《上皇帝疏》不啻痛哭言之”^{[4]197}。马其昶直指新政弊病,希望清政府“速罢不切之务而课实,以责新政之行”^[5]。

清政府在筹备立宪过程中,全国各省相应成立了省级立法机构谘议局。近代烈士王虎臣曾于1907年11月间,随韩德铭、梁建章等人倡办省谘议局筹备处^[6]。直隶省于1909年10月14日成立了顺直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于1909年10月14日至12月3日在天津举行,选出了9名谘议局议员,其中包括刘春霖、籍忠寅^[7]。1910年4月15日,顺直绅商再次召开大会,讨论继续请求速开国会。大会选举出请愿代表,其中包括贾恩绂、韩德铭、刘培极。三次请愿活动均失败,1910年12月16日,贾恩绂被顺直谘议局选定为第四次请愿代表。国会请愿活动促成了清末立宪派的政治团体。1911年雷奋、籍忠寅、孙洪伊将国会请愿同志会改组为宪友会^[8]。

参与社会管理是莲池学子参议政事的最终目标。梁建章于1904年考入陆军学堂,后被送往日本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曾先后在直隶省警务局、浙江抚衙警务局任参事。尚秉和于1902年应试,以优贡第四名中举,翌年中二甲进士。又从日本人习法政2年,入清廷巡警部,任主事员外郎。王树枏于1906年代理新疆布政史,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进行治理:创立新章,限制地方官征税;由布政司署自制库秤,统一官制度衡,设铸币局,铸造饷银、印官票;创设农业试验站,提倡种植蚕桑^{[9]240-241}。李刚已于1898年在山西任大同知县,后连续七年任代理知县和代理知州。每至一县,他都要邀集当地士绅,询查民情,适宜施治。

在教育领域,莲池学子积极参与新式教育改革。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为清末兴学提供了制度保障。学堂深造、兴学育才、赴日留学是莲池学子参与近代新式教育改革的三种途径,其中,兴学育才包括创办新式学堂和参与新式学堂的教学管理。留日包括留学和学务考察,如齐福丕、刘登瀛、胡景桂、傅增湘等人赴日进行学务考察,刘春霖、邓毓怡、高步瀛、杜之堂、吴闿生、邢赞亭、籍忠寅等人赴日留学。这个非正式的留日群体吸纳了日本先进的思想、理论,为他们归国后进行教育活动打下了知识、思想方面的基础。莲池学子在清末兴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为三种类型:专门从事教学、专门从事教育管理、从事教学和管理。如:齐福丕、刘登瀛、高步瀛于1904年担任直隶学务处查学人员;胡景桂于1902年任学校司督办,傅增湘后来为直隶提学使;齐福丕、杜之堂、刘吟皋创办小学堂;傅增湘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等三所新式学堂;刘若曾创办了辰州官立中学堂,刘培极创办私立诚慎中学;邓毓怡创办白洋桥镇私立启智学堂和自强女子学堂;刘春霖出任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姚永概和姚永朴于1903年同时就职于安徽高等学堂。

在文化领域,莲池学子的文化情结系于莲池。1904年,莲池书院被改为校士馆,后改为文学馆,聘请贺涛为馆长。贺涛之才高,于吴汝纶有出蓝之誉,“涛之所以智过其师,则在雄峭而出以浑厚,沛然出之”^{[4]178}。吴闿生早濡家学,后受学于贺涛,“既以守汝纶遗绪,穷数十年之力,传写父书,尽布于世”^{[4]191}。

二、莲池书院学子在民国的从业概况

民国前期,共和与专制成为贯穿社会的两大主线。莲池学子在共和与专制氛围中,实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政治领域,莲池学子经历了民初的政治动荡,并在政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莲池学子参与了南北议和。谷钟秀以直隶省代表身份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各省代表,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四川傅增湘均以全权大臣名义,用照会分致各代表”^[10]。傅增湘在《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回忆道:“辛亥十月,唐君少川奉命南行议和,余以参议偕往。”^{[11]41}

其次,莲池学子组建政团或政党。1912年3月,籍忠寅和范源濂在天津成立国民协进会。1912年4月11日,谷钟秀等在南京组建统一共和党。1912年,由共和统一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民国新政社六团体合并改组民主党。民主党在直隶设立了民主党直隶支部,贾恩绂、步其诰、崔谨、韩德铭为常务干事^[12]。1913年10月,谷钟秀等在北京组建民宪党。由于改组或跨党,上述政治团体常常拥有共同的党员。谷钟秀有6党籍^[13]。

再次,莲池学子参与了护国运动。1914年,当袁世凯解散国会后,籍忠寅暂时避而远之,当云南举义讨袁时,奔赴云南。籍忠寅任云南护国军参议^{[14]135}。谷钟秀于1914年初创办《正谊》杂志,后于1915年发起成立共和维持会,“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14]66}。马其昶作为总统府参事,但不为袁世凯所左右,作《上大总统书》,反对袁世凯称帝。近代人士林纾评价为:“所上皇帝书,若魁帅提挈百万之众,进止号令,皆中兵法。”^[15]

在经济领域,莲池学子追随中国民族工业的脚步,兴办实业。1915年,刘吟皋任农业畜牧园艺主任,并赴美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回国后主编《畜牧部调查记》一卷,致力发展农业。邢赞亭从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参事督办、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民国初年,他即以振兴实业相号召。初在唐山创办造瓷工厂,以抵制东洋瓷器,旋在天津创办生生工厂和生生银号^①。1914年,刘春霖任大总统府内史秘书。袁世凯派刘春霖到农事试验场兼任场长。及至1922年,刘春霖在试验场整顿场务,添购动物,修饰场内建筑,开设学堂。叶崇质在民国弃官去天津举办实业,先后参与开办了三家实业: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银行。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已成为河北省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件大事之一,被誉为民族业发展的旗帜^[16]。1913年,梁建章调任直隶省实业司司长,在天津首创内河行轮,创办了恒源纺纱厂和天津炼钢厂,为直隶省工业振兴打下了基础^②。他的学生任启圣说:“河北之有纱厂、棉田,有良种及内河之行走小轮,皆自公始也。”^{[17]243}

在教育领域,莲池学子潜心教化,推进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书院讲学。

首先,莲池学子通过教学或管理等途径,继续从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工作。1911年,辛亥兵兴,李刚已起而响应,复至大同,兼署知府。1914年,受聘于保定高等师范国文部,专授国文^[18]。1912年,杜之堂任天津第一女师学校国文、历史、习字教员,“他讲解韩昌黎的文章精细深透,有声有色,往往汗透衣衫,犹欣然自若。讲完课即令群生同往厨室,同包水饺而食,大家欢畅一堂”^③。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姚永朴在北京大学任经文科教员,姚永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务长,吴闿生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务长。1915年,姚永概等人应徐树铮之聘教授正志中学。姚永概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姚永朴授《论语》、文学、《文选》、修身,马其昶授《春秋》。1917年,姚永朴离开北京大学。1920年,姚永朴教授正志小学,作《论语述义》、《正志小学修身教科书》。南归,主江苏东南大学讲席^{[3]329}。1925年,皖人举姚永朴为安徽大学校长。力辞不获,出任教授。1926年秋,姚永朴至南京,教授于东南大学。1928年,姚永朴就安徽大学教授之聘。其时永朴已目盲,每临堂讲授,由侍者扶入教室,坐定后开讲,庄言谐语,妙趣横生,称引诸经,所云某页某行,无一错讹,诸生叹服^{[19]272}。1915年,高步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虽有改进教育的方针政策,却不能实行,惟倡行阳历,制新戏曲,改良旧制,所以导启民智,改变陋习,皆其事之小焉者”^{[20]261}。1927年,高步瀛辞退司长职,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2

①参见《南宫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出版,第117页。

②参见《大城文史资料:第4辑》,1995年出版,第97页。

③参见《广宗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出版,第105页。

年,日寇陷榆关,因国立大学经费无着,三个月未能发放,北平各校教职员大多怠业,高独报学术救亡之旨而教授不辍^{[21]24}。他“深得门人弟子之敬爱,称贤师焉”^{[20]262}。1917年底,傅增湘充王士珍内阁之教育总长,下二届内阁均留任。傅增湘任职教育总长期间,一方面落实各类专门性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案,也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一些教育问题。

其次,书院讲学是莲池学子在民国从教的一大特色,当时有较大影响力的书院当属沈阳萃升书院和河北保定莲池讲学院。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萃升书院乃复校,王树枏被聘为山长兼经学教师,吴闿生、高步瀛讲授词章。九一八事变后,萃升书院虽被迫关闭,但其在短时间内名师荟萃,“课馀之际,向名师求教之人是络绎不绝,学员间相互探究争论之声不绝于耳”^[22]。萃升书院的几位主讲编写的讲义,刊印成册,叫做《萃升书院讲义丛刊》,共15种60册,现存辽宁省图书馆。这批讲义,出自名家,论述精辟,是后世学习古典文学、史学、经学的优秀读本^[23]。

1937年春,河北就保定莲池旧址开设讲学院,梁建章为院长,邢赞亭为副院长,教授包括吴闿生、高步瀛、尚秉和、贾恩绂、刘培极。虽因七七事变,学院停办,但在书院讲学及管理方面,各位教师分工明确。吴闿生担任《古文》及《尚书》两门。“吴师每讲古文一篇,皆能寻其义绪脉络,疏密详略,纵横分合,明灭断续。凡盘郁沉厚之气,澹远高妙之韵,瑰丽奇伟之观,无不指点分明,使人心领神会”^{[17]239}。高步瀛主讲“史记举要”及“文章流别”。时值妻子新丧,停棺在家,然不辞劳苦,按时前往,所得俸酬,悉返书院,以为购置书院之用^{[21]24}。“高师所讲,虽万言不能尽盖,皆网罗群书评其臧否,或独抒己见,反复推求,以窥史公行文立意之妙,使后生闻之,如坐春风化雨,心悦诚服。斯得吴氏真传,论文之高手也”^{[17]241}。尚秉和担任《易经》、《诗经》两门,“先生以《易》本用以为筮,故有卦辞,又有爻辞,其所言皆天地间公例公里”^{[17]241}。贾恩绂担任诸生笔记,“诸生笔记先生皆亲手批改”^{[17]242}。刘培极担任《左传》、《周礼》。莲池讲学院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任启圣曾在莲池讲学院就读,20多年后,任启圣对梁建章仍念念不忘:“老辈怜才逾于骨肉,几使我感激泣下。梁公又特予接见谈话至四小时之久,并垂询南海太炎昔日讲学情形甚详。今事隔二十余年,此情此景尤使我念念不忘也。”^{[17]236}黄寿祺曾于1929年进入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师事尚秉和、高步瀛。当莲池讲学院建成后,他报名为院外研究生。尚秉和为他寄来莲池讲义,黄寿祺遂从1937年4月开始,三次写信与尚秉和商榷,后来此三书分别载于《北平晨报 艺圃》1937年5月3日、10日和6月2日。尚秉和在《答书一》中:“震为小子……然非执事,孰能有此疑?孰能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哉?”^{[24]20}在《答书二》鼓励其“《易经》既深有所入,即当继续用力,成此绝学,甚善甚善”^{[24]21},这种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学术精神成就了“老树当风叶有声”的黄寿祺先生^[25]。

在文化领域,莲池学子修纂史志,著述立说。

民国初年,清史馆开,柯劭忞、马其昶、王树枏、姚永朴、姚永概、吴闿生等人馆修史。1914年,王树枏充清史馆总纂,《清史稿》中咸丰和同治两朝列传、《属国列传》、《食货志》、《地理志》、《逸民传》、《叛逆传》大部由他撰写,又代徐世昌纂修《大清畿辅先哲传》41卷、《畿辅烈女传》6卷、《将吏法言》8卷,并参与了徐世昌主编的《晚清诗汇》的编纂^[26]。1916年,马其昶担任清史馆总纂,“无日不到馆属稿,晨出夕返,风雨寒暑不少间”^{[4]202}。“清史馆之开也,永朴、永概皆从事为协修焉。永朴故短视,步行趑趄;每适馆,永概则肩随扶持”^{[4]208}。《清史稿·食货志》共6卷,一卷中的户口,二卷中的仓库,四卷盐法,均由姚永朴撰写^[27]。柯劭忞的老友张曼石先生曾为他撰写一幅长达214字的长挽联,其中对他入馆修史的评价为:“青史重完人,想奕世直笔褒题,任置忠义儒林文苑遗逸中,纤悉都无愧色。”^[28]

1916年,贾恩绂担任直隶通志馆总撰,1918年完成了《直隶通志》。贾恩绂推崇唐代史学家的观点,并应用到方志编撰中,修方志必须做到体例和纲目清楚;记叙事实时要自成文章,言论生动;书中内容要对现实政治有所帮助,有实用价值;对人物评价要公正客观^[29]。1931年9月,河北省政府在省会天津组建河北通志馆。王树枏任总纂,亲笔撰写物产、谣俗、水道等内容。谷钟秀、贾恩绂等参与其

事。王树枏在回忆录中说：“二月廿二日，省政府聘余修河北通志，同聘者为高泽畬、华璧臣世奎、贾佩卿恩绂、张远伯志潭、谷九峰钟秀、张乾若国淦，共七人。”^[30]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籍学者组建了河北通志馆。谷钟秀任馆长，贾恩绂任总纂，志、传多出其手笔，尚秉和等任纂修。河北通志的价值：灵活多样的沿袭继承，不仅使《河北通志稿》保持了方志的连续性，显示了清末民初的嬗递变革，而且为研究河北社会变迁、地方史的人，提供了资料和线索^[31]。

民国时期，莲池学子在文坛方面崭露头角，文名最著。吴闳生点勘古籍，发掘先人意蕴，摘其微词奥义，开导后学，“论文主奇恣纵横，转变究极笔势，钱基博推崇备至，谓其辞气喷薄而出，以酝酿深醇，头象空邈，而能为沉郁顿挫，其势沛然，其容穆然，震荡错综，是真能得父书之血脉者”^[32]。他于1924年完成了《晚清四十家诗钞》。他将选诗视野锁定在师友渊源上，自言效法姚鼎《今体诗抄》的体例，选定名家佳篇^[33]。贾恩绂也是莲池学子中擅长文者之一。五四运动后，新思潮蓬勃发展，桐城派旧文体受到冲击。但北京的政、学界及社会上中层人物，均与旧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碑、铭、序、传之风犹盛。贾氏既负文名，从望所归，凡遇此类文章，仍多出自贾氏之手笔。贾氏书室中，书架上有《谥墓拓存》十数巨册，均贾氏所撰墓铭、墓表的拓片汇集装订成册者，其中不少还是书法名家书写与镌刻的，另有文稿数巨册，足见其撰写之富^[34]。高步瀛于史学，博览群书，邃于《史记》、《汉书》。于舆地学，通晓天下山川形胜及历代行政治所之沿革。于考据校勘学，精审渊博。对《昭明文选》，致力绝勤^{[21]24-25}。柯劭忞“殚四十余年之力，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考证五十八卷。日本人得其书，咸推服以为不可及，赠以文学博士”^{[35]118}。傅增湘辞职后专心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闲居以来，屏绝世务，因得尽藏书”^{[11]438}。傅增湘收有宋、金刊本约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刊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至今归入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尚有七百余种。此外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亦至三万余卷^[36]。姚永概兼长诗文，尤善作传记。诗文时具国势之感，为别人诗文集作序，也都要叙写人物行迹、交游经历。1921年，姚永概作《辛酉论》八篇，分别为上古、五伦、原孝、从众、谊利、政权、真伪、儒释，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3]329}。姚永朴潜心研读，对于诸家经说无不洽熟淹贯。姚永朴的弟子张玮曾于1914年作《序》，对其所作的《文学研究法》和《史学研究法》给以高度评价：“博综群言，衷以己意，为先生最有心得之作。”^[37]尚秉和自感辛亥国体变更为数千年所未有，在处理政务之余，搜集传记，存录报章，以十年之力，成《辛壬春秋》。该著《出版前言》说：“体例效仿正史，有记、有表、有事略及传记，正文后有叙目，结构精严。《辛壬春秋》是为研究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这一段历史问题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38]

三、莲池书院学子近代从业的当代思考

莲池学子时逢中国近代社会剧变时期，他们在改革和革命的时代中，“此一时代学人之为学治事，经世济民，与其对时代责任之态度”^{[35]356}，足为后人借鉴。

1. 融入民族精神缔造的潮流

莲池学子也曾徘徊在近代社会的历史潮流中，但他们的社会心理在曲折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既不为政潮所推激，又保持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气节，融入了近代民族精神缔造的潮流。

首先，他们蒿目时艰，忧国忧民，用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和爱国热忱，引领了当时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潮流。贾恩绂“不追逐于名利宦场，一生惟致力于文章，有粹然旧儒者风”^{[34]25}。他于民初曾两次当选为省会及国会议员，均不愿就职。谷钟秀“人民国为众议员，初隶共和党，每会议反对国民党甚力，后改组遂为统一党重要人物。……帝制议起，乃南下议倒袁。后冯国璋沟通南北主恢复旧国会，谷钟秀赞助之力为多”^[39]。任启圣在《梁院长事略》中评价梁建章：“论其行谊，居官可入循吏，在野可称高士，处污秽之围而不染泥泞，遇残暴之徒而不为所惧。从容儒雅，淡泊自甘，惟日以富国利民为急务。”^{[17]243}在“五四”运动中，傅增湘抵制北洋政府罢免蔡元培的命令，愤而辞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评价为：“直至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沅老直斥当局，投牒拂袖而去，南游维扬，毅然高蹈。”^[40]

其次,莲池学子的思想主张、名言警句、爱国行动,融入了当时追寻独立自由的时代进程。在民族危亡之际,这种精神影响力产生了持久的震撼作用。如,李大钊任《晨钟报》主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仍然常到邓毓怡家做客,保持着密切联系^①。李大钊为中国近代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革命思想认识与邓毓怡的指导有着直接的联系。杜之堂于民国时期在天津任职,与威县早期共产党人刘啸东成为莫逆之交,并以名士身份为掩护,为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窃踞津沽,多次拉拢邢赞亭为日本效力。当“伪天津市政府,强迫生生工厂为侵华日军生产军衣、军袜等,赞亭不便再次拒绝,于是顺水推舟,瞩生生工厂利用给日军生产军需的名义为抗日军队生产一些衣被、毛巾、袜子等急需用品”^{[19]264}。日军侵占北平,高步瀛辞去教职,隐居幽巷,闭门谢客,并嘱咐其二女儿辞去艺术学院的教职。伪师范大学成立后,诱迫其任教,被其严词拒绝^{[21]29}。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吟皋力主抗日,随身携带说书的大鼓,去周围各村进行抗日演讲,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2. 脉脉相传,未尝间断

邢赞亭在《莲池书院忆旧》中评价莲池书院:“脉脉相传,未尝一日间断。”^[41]莲池学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书院教育进行了后续评价。

民国以政客、军阀著称的风云人物徐树铮曾与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贾恩绂等有交往经历,他在《上段执政书》中评价为:“反政以来,文教废坠,道德沦亡,读书种子,日少一日。如柯先生劭忞、王先生树枏、马先生其昶,经术词章,为世所师,皆已年逾七十。若姚永朴、贾恩绂诸先生,年辈差后,亦皆六十内外……此数叟者,蛰居都门,著书讲学,矻矻罔倦。”^[42]

莲池学子的思想和文化通过后人来传递,实现了文化传递功能。马其昶弟子传其学,“其昶既死,而号能传其学以授徒者,曰同县叶玉麟,字溥孙,诸生,与李国松受业其昶最早,为高第弟子;刊有《灵贶轩文钞》一卷,中有《含纯女士传》,题下注代通伯师,而其昶《抱润轩集》亦收之”^{[4]202}。姚永朴的弟子影响力大的当属马厚文和吴孟复。马厚文谨遵老师教诲,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桐城文派论述》、《桐城五先生传》、《增订姚惜抱年谱》、《桐城近代人物传》、《桐城诗选》^{[19]273}。吴孟复在古诗文研究、语言文学方面造诣甚深,其弟子许振轩点校了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许君亦以文章教授,声溢江淮间。今复点校先生此书,于句读之间,见神气之迹,使读者仿佛亲承先生馨欬”^[43]。高步瀛执教于北师大,他的重考据、重实证的学术态度对北师大当今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弟子著名者如小说考据家孙楷第、目录学家王重民、《史记》研究家程金造、诗文笺释家王汝弼。

3. 留文章,照后世

李刚己曾被评价为“留文章,照后世”^[44],莲池学子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讲义、专著、诗集、方志等和其思想观点一起构成了学品人格的内涵,详见表1。

4. 莲池书院学子与大学人格的养成

莲池书院是莲池学子人格的养成地,莲池学子获得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判断能力。莲池书院教育为他们建构了一种多维度时空,使他们在日后社会生活中得以分化并超越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近代从业状况以及个体的主观选择大都趋向于正向发展。

学子情深集聚了精神和情感的力量,化为意志和信念,支撑着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化进程。

第一种学子情深体现在学子交往层面。莲池学子注重学友间的切磋,友情伴随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尚秉和“少年精力强壮之时,为制艺所困,不得专致力于诗古文。乃通籍后始专意为之,而吴先生已歿。乃问法于吴北江(吴闾生)、常稷笙(常培璋)、贾佩卿(贾恩绂)、刘莘西(刘乃晟)诸同学,凡有所作,无不就正”^[45]。尚秉和的《辛壬春秋》于1924年刊行,邓毓怡题写扉页书名,王树枏、吴闾生、谷钟秀等人为之作序。王树枏高度评价尚秉和为“详咨精择以成一代之信史”,吴闾生称赞为“奇作”^[46]。刘若曾写信请求马其昶赠言,马其昶当时处于即将南返并归隐故山的情形,他在《答刘仲鲁书》中告诫好友要

^①参见《大城文史资料:第3辑》,第53页。

表1 莲池书院学子著述

莲池学子	文集
李刚己	《李刚己遗集》(民国刻本)
贺涛	《贺先生文集》、《仪礼》
吴闾生	《诗义会通》、《北江先生文集》、《北江先生诗集》、《周易大义》、《尚书大义》、《孟子文法读本》、《左传文法读本》、《左传微》、《汉碑文苑》、《古今诗体约选》、《古文范》、《国文教范》、《晚清四十家诗钞》、《吴门弟子集》、《汉碑文苑4卷,附编一卷》(武强贺氏,1926)、《生民有相之道解 于思泊毛诗新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韩集点勘》(莲池印书社,民国)、译著《和文释例》、《支那国学论》
贾恩绂	《盐山新志》、《定县志》、《南宫县志》、《清苑新志》
谷钟秀	《中华民国开国史》新善本(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
刘彤儒	《说文异诂笺》
刘春堂	《石林文稿》二卷、《诗文浅说》一卷、《民国高淳县志》
常培璋	《寄斋文章》八卷、《诗钞》一卷
邢赞亭	《求己斋诗集》
刘培极	《周秦诸子评议》、《左传文法读本》、《经论新说辨误》、《楞严释要新学》
杜之堂	《书法讲义》四卷、《瀚华斋诗文稿》一卷、《广宗文史资料》
韩德铭	《莲云庵诗文集》卷首
杨金钥	《启周遗稿》1卷
邓毓怡	《大城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欧战后各国新宪法》(1-3编)(北京宪法学会,1922年9月—1926年4月初版)
梁建章	《察哈尔省通志》
王树枏	《新疆图志》、《新城县志》、《欧洲列国战争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彼得兴俄记》、《希腊学案》、《希腊春秋》、《陶庐丛刻》、《陶庐文集》、《陶庐诗集》、《陶庐续诗集》、《故旧文存》(民国16)、《汉魏六朝砖文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陶庐老人随年录》
尚秉和	《古文讲授谈》、《国文讲义》、《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辛壬春秋》、《周易尚氏学》
李景濂	《学部条议存稿》
刘登瀛	《伦理讲义》1卷、《诗文集》4卷
崔栋	《周易大义》3册、《尚书今文》28篇、《诗大义》2册、《周礼讲义》1册、《周官日记草》、《仪礼汉读考》1卷、《仪礼日记草》、《五经大义》1册、《经说随录》2册、《立义坚确稿》
廉泉	《南湖东游草》、《南湖集古诗》、《南湖己未东游草》、《南湖居士拈花集》、《潭柘纪游诗》、《南湖集》
蔡如梁	《曲波移诗文集》十六卷、《外集》八卷、《中外大事表》八卷、《四元通例》五卷,现在仅存有《曲波移诗文集》三卷
柯劭忞	《春秋穀梁传注》(十五卷)、《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译史补》(六卷)
马其昶	《诗毛氏学》、《尚书宜诂》、《抱润轩文一卷》、《英夷入寇记二卷》、《定本庄子故》、《三经谊诂》、《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抱润轩遗集》、《抱润轩文集》、《桐城耆旧传》
高步瀛	《唐宋文举要》、《孟子文法读本》、《唐宋诗举要》、《文选李注义疏》
傅增湘	《侨工须知》(1919)、《静嘉堂文库观书记》(1930)、《东西京诸家观书记》(国闻周报社,1930)、《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衡庐日记》(天津大公报社,1935)、《藏园群书题记续集》(藏园刊成,民国27年)、《藏园老人遗稿3卷》、《藏园游记》、《文苑英华校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老人遗墨》、《藏园遗稿》
姚永概	《孟子讲义》、《慎宜轩日记》、《慎宜轩诗集》、《慎宜轩文集》
姚永朴	《起凤书院答问》、《敝帚斋主人年谱》、《惜抱轩诗集训纂》、《蛻私轩文稿一卷》、《尚书谊略》、《旧闻随笔》、《文学研究法》、《论语解注合编》、《史学研究法》(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38)、《诸子考略》(北京资研编译社,1928)
徐德源	《中国历代法制考》(1911年)

坚守节操。

第二种学子情深体现在学子对莲池书院的怀念层面。他们对莲池书院及吴汝纶先生的怀念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深沉、久远的师生之谊也是他们参与近代社会的精神力量。

吴汝纶逝世后,莲池学子通过各种方式以示悼念。“贺涛既为之状,且表其墓;而(马)其昶则更为《吴先生墓志铭》以章之”^[41]¹⁹²。多年以后,他们依旧深深怀念当年的学习生活。刘春霖于1931年的《六十自述诗》中回想起“学古堂前莲似海,临漪亭畔树如烟”^[47]。傅增湘在《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说:“先生所以勤勤诏海者,欲使通过世故,乘时自效,匪徒以文士相期也……由今思之,修名不立,志业无成,诸先达奖借之厚,愧负深矣。”^[41]⁴²⁹1932年,傅增湘重游保定莲池,在《秦游日录》中写到:“回忆已四十余年,自顾白发盈颠,无复少年豪兴。念此辄为惘然。”^[48]

籍忠寅曾在谷雨日邀集莲池同学写影北海,他在《谷雨日与莲池同学谷九峰、常朗斋、邓和甫、刘宗尧、徐润吾、刘治琴、刘润琴、王琴南、高阆仙、邢赞庭、吴咏湘、常稷笙写影北海濠濮间,图成,题长句记之》中说:“十有三人会济济,同是莲池旧桃李。昔日风云气驱使,狂来直与天拼死。”^[49]籍忠寅的长句回顾了莲池学子当年驱使风云、与天拼死的英雄壮举,回应了当年吴汝纶所提出的文以致用的时代精神。与其他学子的回忆一起,构成了莲池情深与时事感怀的壮美篇章。

莲池书院学子的知识素养和人格养成昭示当代大学生人格养成和道德精神塑造的必要性。大学教育要创设具体的道德情境,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判断。美国德育专家科尔伯格指出,“教育者可以合法地鼓励学生从事与他的政治判断和评价相一致的政治行动”^[50]。大学教育应使学生获得一定的民主能力,并形成对民主能力的信任。大学教育应注重对学生道德精神独立方面的培养,加强对其在合理的道德需求、期望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引导。

参考文献:

- [1]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四集[M].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4.
- [2]泰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一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 [3]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九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4]刘梦溪.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5]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1840—191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04.
-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90.
- [7]张晓辉.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2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80.
- [8]《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简明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74:105.
- [9]柴汝新.莲池书院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
- [10]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Z].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289.
- [11]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
-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641-642.
- [13]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M].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36.
- [14]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5]薛绶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78.
- [16]河北影响中国的一百件事昨揭晓[N].燕赵都市报,2012-08-29.
- [1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教育[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18]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K].北京:中华书局,1997:140.
- [19]程必定,汪青松.皖江文化与东向发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 [20]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学刊:2007年第5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21]张岂之.民国学案:第4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
- [22]孙成德.奉天纪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340.

- [23]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M].北京:中国华文出版社,1993:329.
- [24]尚秉和.答黄之六论易书[C]//黄寿祺,张善文.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25]俞元桂.晚晴漫步[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02.
- [26]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科技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76.
- [27]李 诚.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J].江淮文史,2008(6):79.
- [28]徐一士.关于柯劭忞[J].逸经,1937(25):69.
- [29]孙继民.燕赵历史文化名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33.
- [30]章伯锋,顾 亚.近代稗海:第12辑[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416.
- [31]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通志稿[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8.
- [32]伦 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Z].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77-78.
- [33]闵定庆.《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J].中国韵文学刊,2008(3):78.
- [34]张昆河.桐城派的最后散文家贾恩绂[C]//李骏昌.山左鸿爪.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5]王梓良.中国近代学人象传初辑[Z].台北:大陆杂志社,1971.
- [36]谭卓垣,伦 明.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22.
- [37]姚永朴.史学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 [38]尚秉和.辛壬春秋[M].北京:中国书店,2010.
- [39]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1[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151.
- [40]谢国楨.瓜蒂庵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67.
- [41]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集萃 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7.
- [42]戴 逸,汪润元.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民国初年(6)[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1197.
- [43]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218.
- [44]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649.
- [45]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453.
- [46]尚秉和.辛壬春秋[M].北京:中国书店,2010.
- [47]王凯贤.中国历代状元诗:清朝卷[Z].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402.
- [48]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403.
- [49]余荣昌.故都变迁记略[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34.
- [50]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92.

The Reviewing of the Pupils of Lianchi Academy in Taking up Occupations of Modern Times

Li Zhanping¹, YanYin²

(1. He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2.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upils of Baoding Lianchi Academy came as the upheaval period of modern times of China, who took part in social activities of modern times. They became famous in Literary world, became strong in official career, revitalized industry and engaged in teaching, which provided some references for today.

Key words: the pupils of Lianchi Academy; taking up occupations; the national spirit; developing personality; learning and doing things

(责任编辑 石丽娟)